

鲁迅

最受诬蔑的人

房向东 著 ● 上海书店出版社



鲁迅：

最受诬蔑的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最受诬蔑的人 / 房向东著. -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3

ISBN 7-80622-485-8

I. 鲁… II. 房…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7125 号

责任编辑：陆坚心

封面设计：程 钢

鲁迅：最受诬蔑的人

房向东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2000 年 5 月第一版 200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7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8000
ISBN 7-80622-485-8 / I·142 定价：20.00 元	

题 记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生平业绩时说：

“凡是为某种事业进行斗争的人，都不可能不树立自己的敌人，因此他也有许多敌人。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他在欧洲是一个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恩格斯：《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3页）

是的，鲁迅一生，也是为着某种事业进行不倦斗争的一生，因此，他不可避免地成了现代中国最受诬蔑的人。当然，“敌人”的概念在这里未必都是指阶级或政治的对立，它更多的是指价值观念的不同与思想的冲突。

序 一

何满子

不论当代人对鲁迅作了多么高的评价，未来的历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得多。

何以故？是时空的距离使鲁迅的形象在后人的眼里显得比近在眼面前或相距不远的当代人更为高大吗？诚然，在时间和空间上愈贴近伟人的人，是习焉不察地觉不出对象的巨大分量来的。此所以周海婴会嘟哝着“这种爸爸，什么爸爸”！这绝不仅由于童稚的天真无知，直到近来，我读周海婴回忆和论述他爸爸的文字，仍然看得出对他伟大的父亲没有作当量的定位。这也难怪，他和伟人太贴近，太腻昵了。当隔海遥望的日本作家左藤春夫尊鲁迅为“东洋第一大师”时，鲁迅近处的似乎是得风气之先的文人却贬斥鲁迅为“没落”、“朦胧与无知”，不值一文。以上的例证是空间差距所导致的辨认上的分歧，远的正确，近的迷误。不过，那些曾经讥薄鲁迅“朦胧与无知”的人，几年之后又对鲁迅表示尊崇了，这似乎也体现了令人苦恼的时间差距。

但我所断定的未来的历史家将比当代人更高地评价鲁迅的理由不在此。我所持的理由有二，分述如下：

其一，历时愈久，则鲁迅生前死后加之于他的污垢浊水，明枪暗箭，不怀好意的抬举，有心的中伤和无意的曲解，都将愈益黯淡失色。人们所看到的将只是经过澄清了的历史长河的运行以及巨

人在历史中的伟岸风姿，他如何和历史气息相通，扮演着引涛疏流的光辉角色。后代人不再有恩恩怨怨、爱爱仇仇，不会为各种因公的和因私的功利之念所蔽。更重要的是，与鲁迅并世或相后先的伟人或准伟人，在时过境迁之后也已形态毕露，他们给历史投下了什么，是非功过如何，也能够和鲁迅作客观的比较了。那时的人不再有忌讳或顾虑，是什么还他以什么，诚所谓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比较之余，鲁迅的形象当然出类拔萃的高大，不像今日之还有七嘴八舌了。

其二，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归根究底是由于其能创造文化和文明。一切震慑人群的事功都只是暂时的，战争杀伐，王朝兴废，乃至制度更迭，受惠或受害只限于一时，数十年或数百年，只是无限时序中的一瞬，而文化和文明的伟大创造则是历久不衰乃至是永恒的。谁记得神圣罗马皇帝？但人们永远讴歌但丁的《神曲》；谁记得詹姆士一世或伊丽莎白女王？但莎士比亚却永远是英国人的骄傲；谁记得魏玛大公和维也纳神圣同盟的各国帝王们？但哥德却光耀奕世。一些英雄攫取了权力，主宰了世界，即使他们干的尽是好事儿，蒙益的也只是同代人或延泽若干年，何况这类角色的负作用往往甚于其所产生的正面功勋；有些所谓业绩还都是同伙人或党羽以及盲从者们鼓吹出来的虚美之辞，还须经过后世的考验。惟有文化和文明的创造者，即罗曼·罗兰所说的“以心而伟大的英雄”才是推进文明延泽永世的。尤其因为，那些以事功享名的人物不是一个人的能耐，都必须众人的参与，而且他们在建成事功后必十倍百倍地取得报偿；只有“以心而伟大的英雄”才是独立的创造，他们只有奉献，没有夺取，终生如鲁迅所说的吃草挤奶。因此，历时越久，未来的人更能认知其伟大。

因此，历史终将证明，鲁迅即使不是中国历史中的第一伟人，也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第一伟人。郁达夫在鲁迅死后曾说，一个不知道尊崇伟人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这是鲁迅同代人的卓

越识见和深长叹憾。郁达夫是看到了鲁迅生前所受的攻击、污蔑和中伤的，而且也看到他死后所得的评价，哪怕是肯定的评价也未能惬意贵当，故而发出了如此的感慨。他来不及看到鲁迅死后半个多世纪围绕着鲁迅的一切，而且这一切还将继续下去，直到围绕着鲁迅而生发的一切公私恩怨为历史所冲淡。到那时，对伟人的这一切咒骂、中伤、曲解纷纷剥落，成了伟人巨像下的尘埃，甚至累积成小丘，倒反而会化为这座像的自然景观中的一些点缀，即使只能供游人践踏，总还不失是历史的沉渣。

但对和鲁迅尚贴近或时距不远的当代人，那些曲解和污蔑鲁迅的材料却是很现实的教材，从这里可以看出伟人是怎么战斗过来的，他又怎么正是在战斗中，靠这些未来的尘埃而成就其伟大的。甚至对未来的历史家，即使对这些尘埃不屑一顾，或带着怜悯的目光瞥视它们一眼，或许也能激起点历史的感兴，在选择中汲取些可供描述伟人的对比资料，并为当年曾有那么多高矮不等的侏儒而不解，而想起韩愈“蚍蜉撼大树”的诗句，勾起点思古之幽情吧。

房向东先生前年出版了《鲁迅与他“骂”过的人》，意在聚集鲁迅生前环绕着他的喃喃咕咕，对显豁鲁迅的伟大有益；现在他又奋力写成《鲁迅：最受诬蔑的人》，是聚集鲁迅死后环绕着他的嘁嘁喳喳，对显豁鲁迅的伟大同样有益。鲁迅生前曾多次说，他的所以要活着，努力眷护生命，与其是为了爱他的人，无宁是为了敌人，要让那些不是东西之徒因他活着而不舒服。鲁迅死了那么久，仍然有那么多人咒骂，证明他威灵犹在，仍同活着时那样使某些人不舒服，也证明鲁迅不朽。忘了是布瓦洛还是拉辛说过：“世上没有被捧成的伟人，更没有伟人会因咒骂而变得渺小。”鲁迅正验证着这句话。

我曾应约为作者的前一本书作序，因此也乐意为这本《鲁迅：最受诬蔑的人》写下这点意见，即：未来的历史家将比当代人对鲁迅的评价高得多！

1998年7月，上海

序 二

陈漱渝

不知是哪位外国哲人在信中写道：“我咀嚼一下自己的滋味，尝到的只是忍耐，纯净的、平淡的、没有一点拌料的忍耐。”据说，这叫做“新时代的忍耐”。其实，忍耐也是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古训。至今不少人的房内不是还悬挂着斗大的“忍”字，在一些人的案头不是还放置着《忍经》吗？

不过，忍的情况也各有不同。有的“忍”是无原则的消极退避，即忍气吞声。有的“忍”是为了顾全大局，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有的“忍”是为了自我克制。《荀子·儒效》曰：“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性情，然后能修。”不过，儒家也并非单纯提倡“动心忍性”，一旦有人乱了儒家的礼法，他们也会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发动群众，“鸣鼓而攻之”。

房向东先生的新作《鲁迅：最受诬蔑的人》，在我看来是一部不平则鸣之作。面对鲁迅去世之后一些人对他的种种非议，房先生忍无可忍，才奋笔写出了这一篇篇批驳的文字，以张正义而正视听。

当前我们是处在一个异质文化多元并存、文化人以宽容大度为美德的时代，相对那种胡批乱斗、唯我独“左”的岁月，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然而，在升平景象之下，异质的文化观念难道就不会发生碰撞吗？不同甚至对立的观念各自在平行的轨道上相安无事地运转，恐怕只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景。因为数学家告诉我们，

平行线如果无限延长，也终究会有相交的时刻。房先生这本旗帜鲜明、毫不吞吞吐吐的著作，同样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前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鲁迅是不需要任何人捍卫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其坚强的支撑点：鲁迅著作已经进入了经典文化的殿堂，这种崇高地位取决于鲁迅著作本身的文化含量，不是为友者所能抬高，也不是为仇者所能摇撼。不过，凡真心崇拜鲁迅的人们，又总难免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鲁迅的影响，有着明确的是非，热烈的好恶，所以面对那些诬蔑、曲解、攻击鲁迅的言论，他们往往难以保持缄默。因为这种言论虽然不能蛊惑那些坚实明白的读者，但在对鲁迅生平业绩并不太熟悉的大多数读者当中，则难免造成程度不同的混乱。如果有人能对诬蔑曲解鲁迅者以宽容，那么为什么就不能给辩诬者以更多的宽容呢？

“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房先生请我为他的新著作序，大约是想在寂寞中寻找应援者吧。我与房先生未谋一面，既无深交，也无浅交，只是在近些年的报刊中不时看到他的名字，他的一些观点也常能引起我的共鸣，所以不揣浅陋，贸然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我要声明两点：一、离京远行的前夕，我无暇细读这部书稿，因此无法对他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论点发表赞同、反对或修正的意见。二、这部书稿中涉及的对象比较复杂，其中固然有既浅薄而又狂妄的论者，但也有一些为我尊敬的前辈或友人——他们只是某些时候在某些问题上出现了偏颇。房先生不过是就他们的某些具体看法发表意见，并非对他们的全部业绩作出盖棺论定。这种声明也许是废话，但在国情、社情和文坛现状都比较复杂的眼下，行文多加一些限制语，也许能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纠缠和误会。

是为序。

戊寅年白露时节
草于北京
钓鱼台侧

导言：非议鲁迅现象面面观

一

柏杨说过，中国历史有三个虎虎有生气的黄金时代，一个是春秋战国，一个是唐朝，再一个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柏杨的说法精确与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仅就二十世纪而言，“五四”时期造就的一群人杰天骄，堪与先秦诸子相媲美；“五四”时期人文学科的成就事实上成了本世纪的顶点。虽然新时期有了许多名家，但若是以学贯中西的“五四”时期的先贤先哲为参照，时人谁人敢说他们的总体成就超过了鲁迅，胡适、郭沫若？尤其是鲁迅和胡适，我以为，鲁迅一生都在批判一个旧中国，胡适一生都在探索怎样建设一个新中国，他们二者的对立统一，奠定了中国新文化的基础。

后人尊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夫子为圣人，毛泽东尊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孔夫子和鲁迅本人所处的时代都不是废黜百家独有一尊的时代，但是，后人和别人之所以尊他们为圣人，这至少表明，他们的建树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之巅峰。就像孔夫子是春秋战国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地位不可撼动一样，鲁迅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地位是一样不可撼动的。

孔夫子与鲁迅是有其共同的命运的。孔夫子在世时周游列国，戚戚然如丧家之犬，死后呢，享尽哀荣，被供为“至圣先师”，成

了统治者手中的工具，成了投机钻营分子手上的敲门砖。鲁迅在世时，是众矢之的，是“千夫所指”的“国民公敌”。鲁迅生前死后，都是最受诬蔑的人。然而，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鲁迅也被定为一尊，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工具，成了“四人帮”打人的棍子。鲁迅被利用，被歪曲，被肢解，鲁迅成了“两个鲁迅”，一个是作为客观存在的鲁迅，一个成了当权者整人的工具库中一件被经常使用的工具。单纯的鲁迅世界变成了十分复杂的各种各样的鲁迅现象。

埃德加·斯诺曾感到奇怪：为什么鲁迅常常成为中国文坛上争论的中心？鲁迅生前死后，为什么一些人，甚至包括某些左派，常常苛刻地攻击他？是的，我也要问，中国的文人们为什么老是以诬蔑鲁迅为自己的勋业呢？他们为什么要骂鲁迅？有的骂鲁迅的人本身有许多劣迹；在骂鲁迅的人之外，更有不少人有这样那样的劣迹，但他们不吭气。是不是鲁迅的伟大与崇高刺激了他们的某根神经？是不是一定要把鲁迅变得和他们一样堕落了，变成了符合他们的所谓“人的复杂性”了，他们才善罢甘休？

我觉得，从历史的眼光看，鲁迅是伟大的，从世俗的眼光看，鲁迅又是不幸的。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所以历史铸就了他的伟大；正是由于他的伟大，派生出了一系列恶意和非恶意的非议和诬蔑，这造成了他的不幸。鲁迅生前死后，虽有一大批的追随者，但每一个时期总有那么几个人跳将出来，在大庭广众面前对鲁迅叫骂，攻击他，贬损他，扭曲他，利用他……总之，“吃他”。他们张着恶毒的贪婪的圆眼睛，吮吸着鲁迅的血。鲁迅死了六十余年，没有多少安生的日子！

鲁迅是巨大的存在，巨大存在成了巨大的阴影。中国文人有反抗巨大的传统，似乎反抗了巨大，他也跟着巨大起来了。郁达夫风流，在他们眼里是潇洒，鲁迅并没有嫖妓，他们捕风捉影地说有了，于是，就说鲁迅堕落。就像拳王必然要招引许许多多的挑战者一样，鲁迅的巨大存在也一定要招致许许多多人的攻击与谩骂。

孔夫子和鲁迅都处于“拳王”的地位，都处于遭谩骂的地位。有时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不是鲁迅，如果是别的什么迅处在鲁迅这样的地位，那么，他也一定会招惹很多人来“打擂”的。这是奇怪的现象吗？这是不奇怪的现象吗？无论如何，骂鲁迅，或者说非议鲁迅，成了鲁迅去世以后中国文坛隔一段时间便发作一次的带有规律性的感冒。除了毛泽东时代，有了政治的高压，骂鲁迅将百分之百地成为“现行反革命”以外，其他任何时期都不乏非议、诬蔑鲁迅的人。即便是在不许骂鲁迅的时代，鲁迅也不是鲁迅本身，鲁迅无可逃避地成了当权派手中整人的工具。

鲁迅去世的第二天，就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的受非议、遭诬蔑的厄运历程。鲁迅是1936年10月19日逝世的，噩耗传出，几乎全国的报纸，都在10月20日发出了沉痛哀悼的报道。而天津的《大公报》，发出的却是一则“短评”——《悼惜鲁迅先生》，竟然利用这短短的悼文，向鲁迅投出了明枪暗箭，明目张胆地说什么：“他（鲁迅）那刻薄尖酸的笔调，给中国文坛画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青年不少的不良影响。”

青年李何林看到这篇“短评”，当即写出了他的无法抑制的愤言：

给中国文坛画出了一个什么时代呢？按语气当然是“尖酸刻薄”的时代；所谓“不良影响”也就是“尖酸刻薄”的“影响”了！……我要请《大公报》短评记者详细地指出来这“不良影响”的具体内容，让读者看看，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的“不良”！

接着，李何林还说：

鲁迅的一支“深刻锐利”的笔，透入了教授、学者的骨髓和苍蝇蚊子的灵魂；……现在倘是站在中国吸血鬼的代言人的立场，“尖酸刻薄”一定是不足解恨，他这次假使不是因为肺结核而死，应该“食肉寝皮”或者“鞭尸”的吧？何必还假慈悲的

说什么“……我们万分悼惜的”呢？鲁迅先生死而有灵，也决不接受你们的“悼惜”！（《为〈悼鲁迅先生〉的愤言》，见《李何林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鲁迅去世的第二天，就有非议、诬蔑鲁迅的文章出笼，而与此同时，就有李何林这样一生以捍卫鲁迅为己任的斗士站出来反击、批驳，于是，构成了中国文坛的一道独特的景观。

二

几十年来，人们非议、诬蔑鲁迅有些什么内容呢？从鲁迅不是革命家到鲁迅嫖妓，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若是单一地看，很多人也许觉得这些论客不值得一驳；但倘若把各种观点摆在一起，那倒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鲁迅一无是处，鲁迅什么也不是了。

从政治上看，他们认为鲁迅不是革命家，不仅不是革命家，甚至是汉奸。郑学稼的基本论断是，鲁迅身为光复会会员，但在辛亥革命期间并无多少革命行为。接着，在辛亥革命以后，鲁迅却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北京军阀政府的官僚。郑学稼还认为，三十年代的鲁迅并没有真正从事过地下活动，如游行集会之类，因而在左派看来，他也不算是革命家。

鲁迅果真不是革命家吗？

我们看鲁迅的生平，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与旧礼教的卫道士‘国粹派’之战，与北洋军阀刺刀庇荫下的‘正人君子’陈源之辈战，与诱劝学生进入研究室莫问国事的胡适之流战，与国民党御用文人如民族主义文学派战”（何满子语），总之，他与专制的中国战斗，与愚昧的中国战斗，与黑暗的中国战斗……他的一生就是为了要战取一个自由的中国，一个光明的中国，一个有声的活的中国。

思想革命算不算革命？在郑学稼看来，似乎是不算革命的。他理解的革命，大约就是上街游行，大约就是暴力行刺。鲁迅关在家中作文章，不管他作的是什么内容的文章，作者，非做也，故而鲁迅是永远当不了革命家的。

鲁迅在思想革命史上的意义，是有目共睹的。1918年鲁迅参加了《新青年》的工作。同年5月，他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呐喊，引起了强烈反响。鲁迅把自己的思想发现借狂人的嘴说了出来：“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发现了封建制度和封建观念的“吃人”本质，同时，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唤，等等，这一切，不是具有非常深刻的革命意义吗？不仅是《狂人日记》，鲁迅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具有不可磨灭的战斗精神，因而，也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革命意义。

鲁迅不仅是思想意义上的革命家，而且还是切实的革命的行动者。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鲁迅不是革命家？》一节将有详论，这里先略去不表。

郑学稼还用人身攻击的手段，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鲁迅，以此来说明鲁迅不仅不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战士，反而是一个只爱别国（苏联）而不爱中国的人，搞不好，与他弟弟一样也许要成为汉奸哩。书中，郑学稼对鲁迅与周作人已经分道扬镳故意不提，开口闭口所谓汉奸弟弟，他要给人一个感觉，似乎是有其弟必有其哥。是的，鲁迅是赞成过苏联，可是，孙中山不也赞成过苏联吗？这怎么能与周作人当汉奸相提并论呢？

郑学稼还随心所欲地诬蔑鲁迅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暗中保护”，他简直把鲁迅描绘成了汉奸了！如此无中生有，这不是政治陷害又是什么？这样立论真是伤天害理！现在不少名人学者动辄

说鲁迅爱骂人，不宽容，可是，他们对郑学稼之类的陷害，却视若无睹，充耳不闻，无怪乎有人要问，谁宽容过鲁迅？！

从思想上看，他们认为鲁迅不是思想家。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说：“然而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鲁迅批判》，1936年1月北新书局第一版）李长之的结论是：鲁迅没有思想，因为他只有攻击的一方面，没有建设，所以只有零星的杂感而不成系统。

这种见解在攻击鲁迅的阵营里，算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梁实秋就问过，鲁迅到底自己有什么见解呢？他说：“没有人能说清楚‘鲁迅思想’是什么……鲁迅思想，其实只是以尖酸刻薄的笔调表示他之‘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而已。而单单的‘不满于现状’却不能构成成为一种思想。”施蛰存也说，鲁迅是没有自己思想的。他说：“鲁迅者，实在是一个思想家，独惜其思想尚未能成一体系耳。惟其思想未成一体系，故其杂感文集虽多，每集中所收文字，从全体看来，总有五角六张、驳杂不纯之病。使读者只看到他有許多批评斥责之对象，而到底不知他自己是怎样一副面目。”此外，也还有一些人所见略同。

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认为，鲁迅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周作人、叶公超都持这样的观点。

我要说的是，有没有思想系统，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思想为现实社会解决了什么问题。

什么叫思想家？怎样算有了思想体系？孔夫子有没有思想？毛泽东有没有思想？如果我们承认孔夫子和毛泽东都是思想家，那孔夫子的思想不是由许多对话组成的吗？毛泽东思想也不是由“概论”一类的书来完成的。换一句话说，毛泽东思想也是由一篇一篇的文章堆垒而成的。这些文章里面有的固然是论文，但也有杂文，也有书信，等等，等等。和孔夫子、毛泽东一样，鲁迅也有自

己的思想及其体系。

针对李长之的鲁迅不是思想家的论断，袁良骏在《误解与真知》一文中指出，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他说：“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列宁诚然是思想家，但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托尔斯泰难道就不是思想家吗？他们也许没有留下什么哲学讲义，但是，他们的伟大作品不都是他们伟大思想的结晶，含蕴着深刻的哲理吗？反言之，没有深刻的思想，他们能成就自己伟大的作品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首先就必须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鲁迅自然也不例外。姑不论鲁迅的数百万言的杂文，即使他的小说，也都是他的伟大革命思想的结晶。像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那样的作品，其思想难道还不够博大精深吗？难道我们能够离开鲁迅的创作实践去苛求什么‘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吗？实际上，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的认识，对社会生活的熟悉洞察，对中国革命的精辟分析，几乎超过了中国当时所有的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家和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已经而且还将他的遗产中撷取那些思想的精华，从而指导自己除旧布新的伟大斗争。怎么能否认鲁迅作为思想家的存在呢？如果鲁迅够不上思想家，那末，小自中国，大至世界，还有多少人可以够得上思想家呢？”（《鲁迅研究年刊[1981]》，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袁良骏认为，鲁迅是另一种类型的思想家，是以文学家的面目出现的类似于托尔斯泰的思想家。在这里，他突出了鲁迅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与全面认识。

由此，我想起有日本人说的，懂中国的有“两个半”人，一个蒋介石，一个鲁迅，半个毛泽东。蒋毛我姑且不论，说鲁迅懂中国，这是肯定了一个客观事实。如此，我不禁要问，难道懂中国的鲁迅，可以是一个不是思想家的鲁迅？在今天，接触过鲁迅所有作品的人，往往被鲁迅博大精深的思想魅力所深深地吸引。不少人甚至认为，鲁迅首先是思想的，其次才是文学的。现在、今后，大约不会

有人再怀疑鲁迅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巨大存在了吧？

从创作上看，他们认为鲁迅不是文学家。首先是否认鲁迅的杂文，认为杂文不是文学。这本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奇特的是，他们不仅否认鲁迅的杂文，甚至鲁迅的小说、散文、学术研究等等，一律都在否认之列。他们有的还从“比较文学”方面有所“发明”，以为鲁迅只不过是一个一般的作家。鲁迅的杂文不算文学作品；他的小说，写得好的也不多，而且全部都是短篇小说，不成气候。有人说，鲁迅在中国新文坛上有多方面的建树，可当团体赛盟主或全能冠军，但在单项中不能摘取桂冠。因为，他的小说比不上茅盾、巴金、老舍，他的诗歌比不上胡适、郭沫若、闻一多，他的散文比不上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

邢孔荣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是一篇攻击毁损鲁迅文学成就的很有代表性的文章。虽然文中用了一些抽象肯定的词句，如“不朽”、“杰作”之类，但通篇都是具体的否定。可以这么说，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人、一篇文章，这么彻底地否认了鲁迅的创作成就。作者写道：“作为艺术家的鲁迅先生之所以不朽……是因为有了《故乡》、《阿Q正传》等四五篇杰作。”对这“四五篇杰作”，作者又是如何具体评价的呢？他认为，《狂人日记》的致命弱点在于模仿，而不是创新。……模仿之作，当然不能成为杰作。其次，作品锋芒直露，缺乏内在美感。“阿Q这个人物基本上还是成功的。但是《阿Q正传》的漫画式的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以所谓的本质代替形象。后来的仿效者们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致把‘典型化’变成了‘脸谱化’。”《祝福》是“《彷徨》中最好的作品，也不失为鲁迅先生的代表作”，“但作品的艺术上有毛病”，“显得勉强生硬”，是“硬性拼装的产物”。鲁迅的代表作也不过尔尔，其他作品当然就完全不值得一提了。照邢孔荣的意见，除了四五篇之外，《呐喊》、《彷徨》里的其他作品，都是“泛泛之作或充数之作”；《野草》是“二流作品”；《故事新编》是